

2004

藤县文史

(第十四辑)



藤县文史

第十四辑

藤县政协教卫文体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月

本刊名誉主编：霍煜梧

责任编辑：李秀港

校 对：马连清、李美海

藤县文史

广西内部资料准印第0520001号

出版单位：藤县政协教工文体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9年10月

承印单位：万丰印刷厂

前 言

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是一项承前启后，有益今人、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征集、出版、发行文史资料可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历史知识，使他们以史为镜，温故知新，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可以匡正和补充历史档案记录不足；可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会自一九八七年起不定期编辑出版了《藤县文史资料》共13辑。得到各位领导、广大作者、读者们的支持和厚爱。在此，我们向一切关心、支持我县文史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为了结合庆祝这两个五十大庆，政协藤县委员会今年于六月在藤城主办了“两广”八市、县、（区）龙舟邀请赛，十五条龙舟分别在西江和绣江河段进行8000米和300米的角逐；国庆节前夕，组织了诗、书、画、摄影展；组织了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庆祝大会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同时决定出版一期藤县文史资料专辑。为了出版这一期文史资料，我们的政协主席和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在年初分别两次亲自组织由解放初期在我县工作的党、政主要领导以及有关的老同志、老领导、老文艺、文史工作座谈，为征集、出版这一期文史作了详尽的指导；当然也得力于许多热心的作者、领导以及

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在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这一期文史资料采用了新的封面，并更名为《藤县文史》。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我们恳切希望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真实具体和有史料价值的事件、人物事迹整理成稿，寄给我们。来稿不限题材，不拘形式，不求面面俱到，一经选用，即酌付酬。我们热切希望各界人士踊跃赐稿，为办好这一刊物而共同努力！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十月



藤县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于1999年1月9日在藤县城隆重召开



9月21日，纪念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大会隆重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藤县政协于99年6月21日在藤县县城举办首届“两广”八市、县(区)龙舟邀请赛。

目 录

1. 于心无悔话当年……………韦振林（1）
2. 解放军挺进桂东与藤县的解放和政建……卢克（17）
3. 建国五十周年忆战友……………陆治南（23）
4. 藤县太平解放见闻录……………黄汉超（26）
5. 解放军进驻三达乡见闻……………卢延任（29）
6. 回忆在太平税站的日子……………杨桑基（34）
7. 不怕牺牲与土匪搏斗的税务干部……………梅铭均（37）
8. 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记藤县中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梁伟俊（39）
9. 前辈风徽……………德邱盈（57）
10. 营造共青林场忆记……………张光裕（68）
11. 落实政策，解除后顾之忧
 ——藤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多基
 本完成落实统战政策任务的回顾……黎开模（76）
12. 调查落实李振亚烈士家乡亲属始末……………黄杖德（85）

13. 黄埔军校校友会藤县会员小组成立经过
 及首次聚会的盛况……………黎开模（94）
14. 科技进步兴藤州……………廖永基（98）
15. 政协等单位倡议建东山烈士陵园
 爱国主义教育代代相传……………黄杖德（102）
16. 回首——岁月如歌
 ——忆述藤县小娘山林场浪漫的
 知青生涯……………黄恩艺（105）
17. 我在侨办的日子……………梅铭钩（110）

封面照片：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藤县政协于1999年6月21日举办首届广东、广西八市县（区）龙舟邀请赛。十五支龙舟队在县城西江与绣江河段分别进行8000米800米的角逐。图为开赛的一个场面。

于心无悔话当年

——50年回顾

韦振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了，1950年元旦后，我从梧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调到藤县，风风雨雨又离休，今天也快50周年了。

我在党的领导与信任下，在同志们的通力合作和群众的密切支持下，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没有什么话可多说，只想在于心不悔上说几句话。

我到藤县来最急需完成的任务是征集粮食，支援前线，满足解放海南岛大军和过境解放大西南大军的粮食。1950年5月上旬解放海南岛的时候，及时调运出军粮40多万斤。在与反动地主武装斗争中，就有28位同志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们的芳名已铭刻在东山烈士纪念碑上。我深深怀念着他们。

难忘的武工队长

在武工队战斗的日子里，为了解救被俘去的乡村干部8个亲属，我以临时特派员身份随队工作。队长傅玉江同志，是一位有10年战斗龄的营级指挥员，凭着他沉着，机智和勇敢的本事，与3名随行战友化装成为一般农民，怀身短枪，在好几个赶圩的群众掩护下，闯入暂时处于政治真空的和平圩侦察。不声不响地抓回土匪的情报员“黄琼”。审讯后取得线索，又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几经较量，终于查明中秋节后第二个圩期，土匪攻打和平圩、烧毁乡政府、使8名干部遇难、洗劫大批物资、强抓8个人作人质的作恶主谋人与策划人。一个是埋伏太平镇充当治安委员会副主任黄耀寅（中

统特务)，一个是匪首黄杰生的文人韦家钧。我们手上掌握了把柄，不断进行政治攻势，软硬兼施，分化瓦解，被俘去作人质的8名干部亲属安全归来了。但这位武工队长现已离开人世。为了写剿匪记我访过他，合照一张相片，至今我还常常想念这个山东汉子，与我艰难与共的战友。

怀疑待审查 仍努力工作

解放初，土匪集中聚集于北部大黎山区，以大黎为中心，还建立“县政府”，猖狂一时。树起两个“军”的旗号。一个是“48军”，一个是“新编第一军”。1950年冬大清剿时，我以剿匪工作大队长身份进驻孟塘（今宁康），成为当地剿匪工委的主任。1951年5月1日，全县剿匪胜利大会召开。由于情况特殊，需坚守岗位，直至7月1日我才能离岗回县，把地方工作交给新成立的大黎区政府。

因为我健康状况欠佳，组织安排我去广州中山医学院检查。回来后，因政府主管秘书姚瓊光调到藤中任主要领导，遗缺且由我接充。大约三个月左右，说我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那段历史是个大问题，于是我没有工作可做了。

不明不白当头一棒，我突然呆懵起来。不过很快又清醒过来，此事应很容易弄明白的，自己安慰自己，不必大惊小怪。

赵唯理县长也如此安慰我。我随他参与剿匪时间有一年多了。

没有工作干，很感寂寞，又觉空虚。原任的财经科科长，刘玉珍同志接了，兼任的税务局局长，马金保营长接了，县人民银行的代表，李保田来当行长了，只保留住县财政经济委员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兼）。这是没具体业务的位置。建国之始，经济状况很困难，战争时期的供给制生活已难应付，

只好改为包干制。为了保证包干制的切实实施，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监督指导机构。有点像纪检监察部门那样。中央的财政经济委主任由陈云同志担任，广西省的由陈漫远副省长担任，贺希明是副职，藤县的主任由赵县长兼任，我为副手，秘书一人，是钟广文。再没有别的人员了。县志及组织史把她与后来财粮贸办同看，与史实是不相符的。

县领导允许我去试办一个地方国营企业——石桥乡石灰生产场。历史上早有这项生产经营，业主多是地主，形势变更，自行停业。我们去恢复，以应群众需要。平南县的同和圩和水晏圩及蒙山县的陈塘街范畴，山冲烂泥田多，反酸严重，缺少石灰，水稻就长不起来。与我同行的有蔡春波、黄远芳、林国平、谢柱、何能慕等，后在当地吸收若干个临时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以体力手工劳动为主的当时，参加日常生活生产工作的，少则每天二三百人，多则六七百人，其时尚没有土改，解缺贫苦农民谋生确是一条出路，且不言赚钱，赈济性社会效果就非一般了。我只是开个头。以后创业兴旺，“大跃进”（1959）时，资产已超20多万元了，与我无关。

1952年2月，桂北独立团调来全副武装的一个连人马，要在藤县建立一个木材公司，由我任经理。要求百天左右，调出坑木一万立方米支援淮南矿以恢复生产。这是工农联盟的具体体现。给我这么多的兵力，是对付不法私商偷入林区乱砍滥伐的对策，或征收，或没收。管辖范围从桂平江口直至藤县。经过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任务，获得第一个表彰。我开始吃工薪制生活了，待遇颇优。

藤县于1952年8月1日用上电灯照明。10月1日动力碾米。县志于332页上说，是1951年4月，县长到广州订购一座发电设备云云。事实并非如此。1951年4

月，赵县长还在大黎参加剿匪，剿匪期间又怎能外出。订购发电设备应是1950年5月。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后是我陪他一道到广州去。款项由银行汇出。处于军管和财政包干时期，款到广州后却不准提取。我陪赵县长往广州市政府向财政经济委员会张副主任询问。张副主任说，若能随便提款，广州的物资势必抢购一空，百废待兴，谁不欲到广州买东西呢。买机械要申请排队，听候安排。他把财政经济管理说一番，有如上政治课。这样，赵县长先行回县，我访同学，四方奔走，终于在广州信托公司计划科找到一位同学，填好申请表，把汇单交给他领钱，我回到县约一个月，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订货合同，並定于52年4月底才能取货。提货事务，是钟广文一手经理。几位老师傅也由他物色。现退休干部谢佐达对此亦有所知。其时我在木材公司工作，只能兼顾询问一下而已，具体事情少过问的。

一下子能够先享受工薪待遇，家庭生活改善宽裕多了。但好景不长。四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八时，赵县长约我相见，此时夏种已经早完结了。赵县长说，同心乡的土改出事故了，声言反对以乡为单位进行土改，要求以村为单位分田，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人从中兴风作浪所使然。县委张书记从三堡区政府赶来劝说，反被包围质问，叫张书记为张大人。要我带队星夜前往，保证张书记安全回来，然后按政策规定，实行以乡为单位分田。结果，张书记安然回县了，查明坏人从中作梗的鬼把戏后，土改顺利进行了，事情就这么样，我木材经理做不成了，领导要我卷行李回县，重吃包干制，代理建设科科长职务。代理不是正式的。无须申请上级任命。

53年，赵县长任县委书记职。已经胜利完成土改的镇安乡，又有人操纵，推倒土改的结果，要求重新以村为单位

再分田。时间已是分秧季节，稍一拖延，必误春耕。地委通知，务必限期解决。被蒙蔽的妇女，不许插田。由女同志去宣传男女平等，女人犯法，照样拘捕。暗藏的国民党宪兵骨干，惯匪头目，宗派头目被一一查出来了，揭穿其阴谋诡计，终使受骗群众醒悟过来，春插按计划完成。

我这个代理科长又变成下乡工作组的组长，扎根于群众中，搞互助合作化运动，搞科学种田。

1954年春我参加省委组织部在南宁举办的轮训班，预定四个月，学了苏联八至十二章的党史，又学中国革命史（党史）；学了《实践论》，又学《矛盾论》。以史为镜，把自己的历史说清楚。我在香港那段历史，经过外调核对，如实下了结论。我是最早离班的一个。至于组织事，回去再解决，班里党组织不是一级党委，而是临时组织，任务是协助同志解决问题，包括外调。高兴之余，回县后我还带队去参加地区举行的运动大会。

风传我有将调离藤县之说，我也希望成真。自觉在此已不大合宜了，该换个地方更好。

推我向敌人，我要靠人民

记不清是“肃反”或者是“审干”，运动一个个扑面而来。我在省委组织部轮训班的结论化为乌有了。在九龙与黄汉杰几分钟相见竟引起轩然大波。事情是这么样的。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数天之后，潜身在九龙塘华清池作售票员的地下工作者李剑珊（女）约与她一道往九龙街上买点东西。我们都是听候消息准备返回广州去的。回返时适遇括大风，並夹有细雨，又正走在威尔敦道上。李剑珊提议说，不如顺便一访她在学生军时代的大队政治指导员黄汉杰老师，他现

在香岛中学任教，住此不远，他在广西被反动政府通缉逃身到香港来的。我说：我没见过他，但知其名，他是我中山大学同学黄汉宁的亲哥哥，我和汉宁同学10年(初中至大学)，有时会提及哥哥的名字，去拜见他一面也好。在李剑珊的引路下终于见到黄汉杰。李剑珊和他有老关系，交谈甚欢。在李的介绍下才彼此互通姓名。我只说与他弟弟的关系，我来港时，汉宁已往东江纵队参军去了。这么样，便匆匆告别了。这又算什么政治历史呢？又算什么社会关系呢？在这件事上，李剑珊并没受过审查，而偏偏要把我来指鹿为马，连续不断地审查无休无止。我内心既感委屈又无可奈何，又觉得似节外生枝，有点气上心头来了。就这么样；我被悬挂起来，上不到天，下不着地。在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不断轮换位置，如走马灯内的小纸人，团团转。在机关，活像一个被观赏的人。有关政治性的报告不准听，学习讨论没有份。特殊者例外。俨然一个被监管的另册人。

1958年5月2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晚上，灯火通明，会场上增添好些我从未一道工作的人，避事实而重分析，异口同声，定我是一个巧辩的“右派”，在县内属唯一的。至此，我更清醒了，原来如此。我回答：是个凭分析成的“右派”。

尽管我的腮腺炎未愈，还是限我三天内离开县城。一位什么样的秘书说：从今以后是阶级敌人了，不再是同志了。万一县城机关出现什么意外，责任难负的。

撤区并乡后的新兴乡党委书记黎胜安，当时的县委候补委员，乐意接我到 he 管辖地区参加劳动，重新做人。

5月5日，我冒着初夏的炎热，背负着简单行李，迈着沉重的步伐，往新兴乡报到。

当晚体温骤升，原病再发，呕吐大作。黎胜安同志亲来照料。火急请黄自智医师来诊治，终使我转危为安。

也许是黎书记有意庇护，没有公开我的“罪状”，对人说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旁听及此，我也不好受的，纸能包火吗？安排我干的活是轻活，叫我做点试验。当年参战剿匪的民兵，出席过劳模会的代表，自然认识我。认为我“下放”至此，非同小可。不过，还是表示友好，也有人说我时运不济。后来我还是自亮身份，请他们指点教育，让我重新做人。无论什么重活、脏活我都参加干。融和一体，乐在其中。

1959年秋，“大跃进”旋风猛括，集体化口号“统一”人们思想，四万人口的原天平区，一下子化成一个红旗大公社。吃饭进大食堂，个人没有炉灶了。实际是穷过渡来捱日子。我房东黄柱仅两周岁的女儿，乳名亚五，因饥饿致病，奄奄一息，安卧于稻草畚箕中，待咽气后而掩埋。见及此，我抚探其胸腹，还有微温；细听呼吸，还微弱地在延续。于是抱回房中，她还会吸吸米汤。我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找医生，要求开方给葡萄糖粉若干包。事属破例，医生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救活这个待毙的小女孩，最后交还给她父母。她父母含泪接回他们的亲生骨肉。

黄柱有个胞弟，叫黄柱成，是共产党员。他说：你不是“右派分子”，应是“又派银纸”。我说他：你不能胆大包天，有后患。他硬着嘴说：我这个农村党员就这么看法。要整也无官可丢。

大跃进之后，迎来三年的经济困难。我又调到公社农科站劳动，但附加要我搞点科普试验。我的爱人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竟然违例之下要还乡生产，即等于无家可归了。天平公社的党委书记李志毅，曾是县公安局局长，是县委常

委。有见及此，体恤我的处境及孩子的可悯，同意转移到天平的社山生产队定居，预批杉木50条作建房之用。这样，促使我安心在农科站搞推广优良水稻品种的试验。

此后，李书记不介别人闲言，带我下乡去检查生产；不计我脸上蒙污，在农业生产问题上，还要我在大会上发言，陈抒科学种田的意见。从而使矮秆良种普及全公社。

为了使科学种田逐步深入推广。天平公社要求各生产大队，在条件允许之下，成立小农科站，使之接近群众，能朝夕相见。在20个大队中有半数大队建立起农科站。口粮和工分报酬一律自给，财务独立核算，使之切实起到示范作用。

1980年起，县进行土壤普查。一向以红泥粘结闻名的天平富双大队的土质。靠连年栽种冬绿肥四川油荳及夏收后实行稻草还田，土壤结构及有机质含量均达到高产田的标准。但推广四川油荳始自1962年，种子来源于已移居香港的土肥干部谭志海之手，从我组织的农科站推广出去。富双大队农科站的麦站长坚持不懈、反复推广、多年积累，取得成果。但总结写书时，却被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分配到天平区（公社）工作的人所独有，享得荣光。在此，我没有丝毫争光之意，这不过区区、点点、滴滴之劳而已，何必介意。但人心不测这一点要有足够估计的，

1998年离休老同志体检。掌握胸透的年青医生谢连汉。一看表上名字，却说早有所闻了，不禁使我顿感奇怪。年岁悬殊约半百，何来早就认得我。问其原因。他说从祖父及父辈口中得知，谓我当“右派分子”时，在他家乡劳动过，和群众同甘共苦，留下印象。他还说：待我调走后，大家说，看不像坏人，竟会论落如此不幸。

这些话，给我有某些慰藉。我自知，只求问心无愧，于